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系列丛书



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系列之二十七

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

周聿峨 龙向阳 等著



NLIC2970858305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系列之二十七

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

周聿峨 龙向阳 等著



NLIC2970868306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周聿峨, 龙向阳等著.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 11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系列丛书)

ISBN 978-7-5615-4215-6

I. ①华… II. ①周… ②龙… III. ①华侨—研究—世界②华人—研究—世界 IV. ①D634.3②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4193 号

责任编辑: 薛鹏志 韩轲轲

美术编辑: 洪祖洵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 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70 千字 印数: 1~1 000 册

定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系列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庄国土

副主编:王 勤 聂德宁(常务)

委 员:王 勤 庄国土 沈红芳 吴崇伯
陈福郎 林 梅 侯真平 聂德宁
蒋细定 廖大珂

目 录

绪论·····	1
一、国际体系层次中的“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	2
二、民族国家层次中的“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	8
结语·····	15

上编 国际体系中的华侨华人

第一章 华侨华人体系的历史演进	
——以世界体系思想为视角·····	20
一、世界体系思想对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意义·····	20
二、华侨华人体系的历史演变·····	27
结语·····	70
第二章 华人移民的地缘政治学分析·····	72
一、从地缘政治学中找寻华人移民的研究起点·····	73
二、地缘政治学对华人移民分布及演变的理论总结·····	75
三、地缘政治学对华人移民发展趋势的预测·····	83
结语·····	86

第三章 华人移民社会地位变迁之研究	87
一、华人移民社会地位变迁的历史回顾	87
二、华人移民社会地位变迁之原因分析	93
三、华人移民社会地位提升之理论途径	96
第四章 东南亚华人身份的流动性分析	100
一、流动性的形态:表层的流动	101
二、流动性的中心核:深层的流动	105
三、流动性的双重构造过程	108
结语	112
第五章 全球化进程中的海外华文教育	
——以东南亚地区为例	113
一、华文教育的含义嬗变及其发展历程	114
二、全球化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	122
三、冷战后“成就困境”中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134
四、冷战后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机遇与困惑	148
结语	157

下编 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

第六章 认同:个人、族群与国家	
——对多族群国家中的华人认同的思考	160
一、认同:个人、族群与国家	161
二、未来趋势:华人认同的变化	176
结语	182

第七章 族群与国家安全:华侨华人与国家间关系

——以中国—印尼关系为例	184
一、脆弱性: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	185
二、族群与国家安全:民族主义与认同	194
三、历史解读:华侨华人与中国—印尼双边关系	202
结语	220

第八章 百人会与中美关系共有知识的构建 224

一、百人会概况	224
二、构建共有知识	227
三、百人会的缺陷	244

第九章 跨国华人及其跨国活动

——以留美华人新移民为例	246
一、关于“跨国华人”概念的认识	246
二、华人跨国活动与跨国技术共同体的构建	251
三、留美华人新移民跨国活动分析	262
四、关于中国制度建设的思考	271

第十章 华侨华人与晚清中国外交近代化 282

一、关于“中国外交近代化”的思考	283
二、晚清中国外交近代化进程中的华侨华人因素	293
结语	311

后记 312

绪 论

2002年,笔者曾撰文从理论、历史与现实三个方面对“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这个命题的知识体系进行过论述。^①时至今日,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生态不断地丰富和改变着“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内涵,特别是国际关系思想的功利主义化和行政化进程促进着“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内涵日益融入不同层次的公共政策之中。有鉴于此,本文借用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②在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两个层次上,对“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命题做出新的阐释,以求教于方家。

① 周聿峨、龙向阳:《关于“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6期,第42~46页。

② 本文在此借用了大卫·辛格(J·David Singer)的层次分析法。J. David Singer,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K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 ed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oretical Essay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77~92。中文文献有[美]布鲁斯·拉西特等著,王玉珍等译:《世界政治》,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页。

一、国际体系层次中的“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

国际体系层次分析可以提供“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互动的一般性行为模式和结论。在这个层面里,无论是“华侨华人”还是“国际关系”都是整体属性的,且“国际关系”决定和影响“华侨华人”的发展。就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与现实存在来看,整体的国际关系可以分为全球性国际体系和地区性国际体系两个方面。

(一)全球性国际体系中的华侨华人

全球性现代国际体系大致经历了四个特殊时期,即 1800—1900 年的殖民地体系时期、1900—1945 年的民族主义觉醒时期、1945—1990 年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冷战时期以及 1990 年以来的后冷战时期。由于“华侨华人”的非国际行为体属性,所以在国际体系的变动中,“华侨华人”一直是一个被动的角色。相对应地,“华侨华人”经历了民族压迫、民族觉悟、民族冲突与民族民主四个时代。

在国际体系发展的各个时期,“华侨华人”因应着国际关系的变革。在殖民地体系时代,“华侨华人”的流向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需求和殖民地扩张相联系,他们被广泛牵引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即全球殖民地。作为外来者,海外华侨处于资本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原住民之间,是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参与者,又是资本主义政治方式的旁观者。在民族主义觉醒时代,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育,海外华侨的民族认同得到释放和张扬,也由于世界战争的需要和包括华侨在内的中国价值在战争进程中的提升,华侨的种族性国家认同得到包容。同时,战争的扩展也加速了华侨华人由资本主义边缘地区逐渐向中心地区进行跨国迁移。在冷战时期,特别是 20 世纪 50—70 年代,由于新中国国家属性的影响,在意识形态的对立和非殖民地化运动中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双重夹击下,华侨华人在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排中被边缘化,华侨华人的政治权利、经

济权利和文化权利受到极大的削弱和限制。特别是独立后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间掀起的排华浪潮,使大量华侨回流中国或被迫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再移民。

后冷战时期,主要有三种力量影响着华侨华人的发展。一是政治民主化的力量。冷战结束后,西方集团在全球大力推行以美国价值观为核心的西方民主观,由此产生了全球性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在西方集团的压制下,发展中国家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得不接受西方的民主政治条件。从理论价值层面来说,这股民主化浪潮是违背人类发展正义的,但就华人的发展历史而言,这次浪潮确实带来了许多实惠。因为政治民主化浪潮带动的多元民族政策使华人在居住国的政治权利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在许多国家,不仅华人的公民政治权利、经济发展与社会权利和民族文化权利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障,如印度尼西亚华人在后苏哈托时代的政治获得;^①而且华人的历史贡献和民族平等身份也得出公正的结论,如加拿大对华人历史的重新评价,^②南非对华人身份的法律确认等。^③诚然,华侨华人在社会生活层面获得的上述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另外,我们也看到,在国际社会的某些领域里,非民主的现象也大行其道,比如,在国际关系的层次里,美国不顾其

① 例如印尼于 2006 年 7 月通过了新的国籍法,废除了原法律中区分“土著”与“非土著”的法令,从而使华人获得平等的公民身份。参阅赵金川:《新〈国籍法〉取消歧视性条款,印尼迈出族群和谐重要一步》,载《参考消息》2006 年 7 月 13 日第 12 版。

② 2006 年 6 月 22 日,加拿大政府总理就 1885 年 7 月加众议院通过的《华人入境法案》,并决定对华人开征“人头税”的这种带有严重种族歧视性的政策向全体旅加华人正式道歉。参阅赵青等:《“加拿大道歉!”还华人以尊严》,载《参考消息》2006 年 6 月 27 日第 9 版。

③ 2008 年 6 月 18 日,在南非法院的一场重要裁决中,南非华裔被重新认定为“黑人”。该判决让南非的华裔可以和其他有色人种享有同等经济福利。参阅劭刚:《南非华人赢得公平待遇》,载《环球时报》2008 年 6 月 20 日第 2 版。

他国家甚至联合国的意愿而单独采取行动的行为。

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就当前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有内在概念和知识体系的理论,而更多体现为一种社会发展趋势和历史发展的进程。作为一个新的时代背景,全球化为华侨华人的发展、转型和迁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机遇。首先,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约束和限制,使华侨华人的跨国迁移和经济资本的全球运作更加便利,使华侨华人应对国家政治风波的能力有了极大的增强,生存空间也有了极大的扩展。其次,全球化进程内在地对民族国家的民主政治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和规则,这将大大改善华侨华人目前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再次,全球化也加强了华侨华人与祖籍国——中国之间的关联。概言之,全球化对华侨华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属性带来了全面影响。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华侨华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国际移民,由于跨国民族的全球属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特殊性之间存在的冲突,^①而使华侨华人仍然以某些族际政治问题的形式普遍存在于某些地区或国家的政治生态之中。

三是中国崛起的力量。中国的崛起是后冷战时代的一个重要国际新现象。作为华侨的祖国、华人的祖籍国,中国与海外华侨华人的关联是必然的。中国崛起对华侨华人的意义在于:首先,中国今天所有的成就都会使华侨华人的跨国移民地位和民族荣誉感得到提升。^②其次,海外华人的社会地位因其居住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而得到不同程度或层次的提高与改善,而且汉语经济价值的提升

① 相关论述请参阅王建娥等著:《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马曼丽等著:《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论》,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姚蒙等:《奥运带给全球华人更大自信》,载《环球时报》2008年8月25日第13版;《海外华人随中国崛起地位上升》,载《环球时报》2008年6月12日第6版。

为海外华侨华人的跨国文化传播和多元认同的塑造提供了方便和基础。再次,海外华侨华人得到中国的领事保护与人道关怀的力度不断加强。最后,中国的崛起正在促进和塑造着影响国际体系进程的华侨华人个体的成长,越来越多的华人成为国际组织的领导者。作为第一位掌管一个联合国机构的中国人,现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类华侨华人个体的出现与成长是“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命题范畴的新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期望。当然,中国的崛起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影响是多重的,也会给华侨华人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如华侨华人的经济贸易与投资行为受到过多的打击,^①华侨华人的忠诚也受到诸多的怀疑,人身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② 在中国与世界日益融合的大背景下,出现上述个别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成为一种常识或规律,那就需要我们警惕了。世界需要中国,中国正影响着世界。中国需要华侨华人,华侨华人正影响着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改变。

(二)地区性国际体系中的华侨华人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关系历史来看,地区性国际体系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和两个时代。两种类型是指发达国家地区性国际体系与发展中国家地区性国际体系,两个时代是指冷战时代的国际体系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体系。其中,欧洲地区国际体系和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对华侨华人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

作为经济发达国家最集中的欧洲地区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地

① 参阅郇公弟等:《中国展商在德国遭查抄事件调查》,载《参考消息》2007年3月22日第9版;田帆:《中国鞋难行欧洲路》,载《参考消息》2005年6月30日第10版。

② 参阅唐勇:《在美华人频遭起诉》,载《环球时报》2004年7月5日第16版;郇公弟:《西方热炒“中国工业间谍”根源何在?》,载《参考消息》2007年12月27日第14版。

区,在这个体系中,华侨华人的数量非常少,不构成国家的主体民族。但是欧洲政治制度对人权的推崇和宽容既让华侨华人向往,又为华侨华人的迁移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因为华侨华人最集中的东南亚地区就是欧洲许多发达国家的早期殖民地。在冷战时代,欧洲国家在政治上追随美国,所以在移民政策上也跟随美国,限制中国大陆公民的跨国迁移,但对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中国人的跨国移民以及东南亚地区华人的再移民则提供了保证。冷战时期,发达国家“反华但不反华人”的政策虽然限制了华侨华人总量的增加,但是也促进了华侨华人向世界体系中心地带的迁移和发展。在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的淡出使欧洲逐渐解除了对中国大陆的移民限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大陆人以经商、留学与投资移民、旅游等形式进一步融入到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区。欧洲成熟的一体化进程为华侨华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方便和机遇,但严格的移民保护政策也制约了华侨华人在欧洲的生存与发展。^①

在华侨华人居住最集中的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一直被视为一种“问题”存在而影响着其所在国的国际关系和国内政策。^② 在冷战时期,一方面,非殖民化进程促进了东南亚新的民族国家的产生与建构,另一方面,受意识形态对抗的影响,东南亚国家又完全接受西方的保护,并成为美国对抗中国的前沿。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东南亚国家大多实行“既反共反华又反华侨华人”的外交和内政政策,华侨华人就成为“民族建构”与“国家安全”的牺牲品。^③ 后冷战时期,东盟实行“大国平衡”的外交政策,改善了对华关系,并在内

① 姚蒙等:《“签证难”制约中国人接触世界》,载《环球时报》2008年8月29日第7版。

② 参阅方金英:《东南亚“华人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

③ Leo Suryadinata, *Chinese and Nation—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7.

政上恢复了华人的许多公民政治权利,但东南亚国家内在的“疑华”心理仍然影响着华侨华人的发展,“中国威胁论”的幽灵仍然在东南亚地区上空盘旋就是例证。^①在这些国家的对华关系里,“华侨华人问题”与边界问题是两个潜在的导火线。在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的公民政治权利之路还十分漫长。

今天,在发达国家的地区国际体系中,华侨华人的跨国迁移是一种对新生活的追求,华人迁移的目的是成为所在国家的新公民,发达国家成熟又多元的政治制度也使移民问题更多局限在社会和法律范畴之中,如北美地区;而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国际体系中,华侨华人更多地是以商人的面目出现的,华人迁移的目的是追求财富,但由于其他条件的限制,大多数华侨华人不会在这些地区定居或成为所在地的公民,如非洲地区;但是,在东南亚地区的体系里,华侨华人的跨国迁移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多地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正因如此,东南亚地区的国际体系与华侨华人便成为世界华侨华人学研究的重点。除此之外,就华侨华人的发展而言,还有三个比较特殊的地区国际体系,一是深受美国控制的、大多数国家与台湾地区保持“外交关系”的中美洲地区;二是地处太平洋地区、大多数国家与台湾地区保持“外交关系”、松散的群岛国家体系;三是中东阿拉伯民族的国家体系。这些特殊的地区国际体系与华侨华人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概言之,全球性国际体系和地区性国际关系的变化正在为华侨

^① 例如,“华人寄居论”仍然存在于某些国家领导人和民众心里,参阅熊平:《“寄居论”激起马来华人愤慨》,载《参考消息》2008年9月11日第13版。菲律宾仍然实行于1940年殖民地时期颁布的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移民法,对以华人为主的外侨实行身份证年度收费政策,参阅《菲华人身份证事件抗争始末》,载《参考消息》2006年7月17日,原文《菲外侨身份证起风波》载于2006年7月16日的香港《亚洲周刊》。此外,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有制订专门打击所谓中国女性非法移民的法律或运动,参阅《一中国妇女在马来西亚受辱,巴达维总理派部长来华解释》,载《参考消息》2005年11月26日第8版。

华人的新生提供积极的外部环境。但是,全球化、地区一体化和民族化之间的冲突又为华侨华人的发展增添了许多变数和偶然性。华侨华人一方面要适应国际体系的变化,同时也要积极作为、应对和化解国际体系发展给自身产生的消极影响。

二、民族国家层次中的“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

民族国家层次分析可以提供“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互动的更具个性特征的行为模式和结论。在这个层面里,“华侨华人”既可以是一个整体,也可以是一个特殊的个体或团体,而“国际关系”则只能是国家属性的,即国家内在的国际关系或国家间的国际关系。由此,民族国家层次的国际关系又可以分为国家间关系和国家对外关系两个方面。

(一)华侨华人与国家间关系

1. 族群的华侨华人与国家间关系

作为族群的“华侨华人”,主要是指居住在中国之外的某一个国家领土之内的所有华侨华人,而国家间关系一般是指华侨华人居住国与中国的关系。^①今天,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对外政策等因素的推动下,华侨华人已遍及世界各国或地区。华侨华人由于负载着特殊的中国属性,它必然嵌入中国与其居住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中,

^① 新加坡由于其民族国家的华人特性而使华侨华人因素深深地影响着其与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因为特殊的地缘环境、历史纠纷等原因使华侨华人因素在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仍具有强烈的脆弱性和敏感性。直到今天,新加坡对其华人属性既没有张扬也没有压制,而是以多元民族政策作为平衡。

包括民间外交与官方外交以及涉及经济、文化与政治的各种领域。^①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所有国家的华侨华人都是影响中国与其所在国双边关系的因素,而是需要作具体分析。就国际政治现实而言,“国家间关系”是自变量,“华侨华人”是因变量,国家间关系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相应国家华侨华人的发展及其所能发挥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侨华人地位的高低或经济发展的好坏就成了判断其所在国与中国双边关系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华侨华人作为族群因素持久性影响中国与其居住国的双边关系的发生地主要在东南亚地区和美国,其他地区和国家中的华侨华人则大多是国家间关系的反映和结果,而非条件。东南亚国家和美国的华侨华人之所以能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因素,是主要建立在以下几个客观条件之上的。

第一,华人移民居住国的历史悠久,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的人数较多或比例较大,甚至在国家法律上已作为一个主体民族存在。自唐朝以后,中国人就开始到东南亚各地进行商业贸易,华人在马来西亚等国是主体民族之一。而 1840 年之后,特别是 1868 年《蒲安臣条约》签订之后,中国人开始大规模移民美国,至今,华人已成为当代美国最大的亚裔群体。

第二,华侨华人社会在居住国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和存在,不仅有一定的社团组织或政党,而且在居住国的经济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东南亚地区华人的经济实力是公认的,而且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华人也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在当代美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科技领域,华人的崛起也是新现象。

^① 有关华侨华人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双边关系中的影响因素的历史分析的重要参考文献有吴前进的《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族》(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等。另外,由美籍华人学者孔秉德和尹晓煌主编的《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余宁平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一书就美籍华人实质参与中美关系历史与现实、作用与前途等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和阐述。

第三,中国与华侨华人居住国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与华侨华人相关联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历史上,东南亚国家和美国都曾经发生过“排华”事件,甚至到今天,个别国家还对华侨华人实行一定程度上的歧视性制度或政策;此外,台湾问题也影响华侨华人的处境。

第四,华侨华人与中国发生联系的愿望和行为。不可否认,华侨华人作为一个不确定的因素间或影响中国与其居住国之间关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比如,近年来在一些非洲国家,如塞内加尔、博茨瓦纳等,一些华侨华人对当地的经济造成一定影响,也开始成为影响国家之间关系的因素。因此,华侨华人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因素既是历史的生成,也有现实发展的成因。当前,华侨华人作为族群因素影响中国与其居住国之间双边关系的内容,主要有经济贸易交往、文化教育传播以及作为利益集团影响政府的中国价值观念与外交决策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结构因应国家核心利益追求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在不断的调整与适应之中。因此,华侨华人虽然是中国国家利益之组成内涵,但由于其不属于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层次,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双边外交关系的影响是有限的。同时,由于地缘、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国家间关系表现出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这也形成了华侨华人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由于在居住国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利具有差异性,所以,华侨华人的发展也体现出一定的地区属性,如在欧美经济发达的国家里,华侨华人追求的目标是高生活水平,华人有宽松的政治环境 and 经济成就,但缺乏政治权利的参与和诉求,被主流社会边缘化;在中国周边国家里,华人虽然已经构成了所在国的民族成分,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一直被当作外来人而被国家民族主义所制约,一直依附于主体民族而生存,经常成为国家政策和重大事件的牺牲品;在一般发展中国家里,华侨华人享有较宽松的活动权利,但是由于所在国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不稳定,华侨华人除了商业利益以外,大多不会长期生活而成为当地民族。